

# AI时代学科调整中,文科该有何种使命担当

■郭英剑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教育体系及其学科布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在本专栏2024年10月15日刊发的《哈佛大学人文学科正经历“关停并转”》一文中,我专门讨论了为何在哈佛大学这样的美国顶尖高校,某些传统文科仍摆脱不了被裁撤的命运。应该说,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高校,尤其是“双一流”高校也在进行新的学科调整,并且出现了“重理轻文”的趋势。

这种趋势不仅涉及课程设置变化,更涉及文科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在AI迅速渗透的今天,该趋势尤为显著。然而,在科技与人文快速碰撞的时代,文科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随着学科调整的深入,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文科的价值和未来,尤其是在AI时代,如何保持其独特性与核心价值,如何推动文科教育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更需要我们给出正确答案。

## 学科调整与重理轻文:“双一流”大学的困境与挑战

近年来,国内高校学科正进行一场重新布局,其中一个重要趋势是某些以文科见长的名校,其学科调整明显倾向于加强理工学科,削减文科,这一点在“双一流”高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该趋势意味着传统的文科比重将逐步缩减,理工类专业将获得更多资源和关注。这是当下“双一流”大学面临的巨大困境与严峻挑战。

该趋势的原因与内在逻辑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源自国家战略与科技发展需求的推动。我国目前正处于实现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国家对AI、生物工程等领域的需求促使高校加大理工投入。在此背景下,理工类学科显得尤为重要,许多高校为了适应这一方向,选择在资源分配上向理工科倾斜。这种趋势并非我国独有,全球许多国家都在加强理工科的投入。

其次,源自市场需求与社会发展的驱动。随着信息时代到来,社会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尤其是AI、数据科学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技术革新和就业市场需求,促使高校不得不将资源向理工科倾斜。AI产业的爆发式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不断推进,让理工科专业的吸引力远超文科。比如,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潮流的涌动,越来越多的企业、政府机构需要技术型人才,这为理工科学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文科专业学生则面临着更多挑战,许多传统行业对文科的需求呈下降趋势。

最后,源自人文学科的长期困境。这种困境不仅是资金和资源的缺乏,更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人文学科价值的低估及其存在意义的质疑。近年来,许多人认为文科所培养的人才“就业难、用人少”,这种误解导致对其资源的削减。部分学校开始将重点转向技术性和职业导向的学科,而文科则被视为“非实用”学科。

AI时代给文科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文科教育需要在保持其传统文化价值的同时,在新时代背景下重塑其核心价值。

文科在学科调整中的困境还表现在学术圈内。许多高校的布局与研究经费更多倾向于支持与科技、工程、医学等学科相关的专业和项目,而对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支持相对薄弱。这一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许多大学正逐步调整研究重点,转向更具科技前瞻性的学科。



郭英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在文中探讨了AI时代文科教育的困境与挑战,并提出了重塑文科核心价值的建议。

有人说,尽管文科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文化遗产与历史深度,但其现代功能未得到充分展现。但我认为,相较于就业功能,文科的核心价值更体现在对人类思想、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反思,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宽容和理解上,其核心作用是培养能全面理解和应对社会挑战的创新性人才,在AI技术和全球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这一点愈加重要。

## 重塑文科的核心价值:文化自信与全球知识体系的对接

在AI技术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文科的核心价值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但正是时代的变革,使文科有了更多机会,可以重新审视并重塑其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地位。我认为,在这场学科调整的浪潮中,文科不仅是文化传统的守护者,更是未来社会的价值引领者。通过深度融合文化自信与全球知识体系的对接,文科教育能够在AI时代找到新的定位和使命。

首先,文化自信应实现从传统文化到现代创新的跨越。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展现文化底蕴与活力的重要标志。在AI时代,文科教育必须承担起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尤其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文化自信不仅是对本国文化的尊重和认同,更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文化传播力的关键。

在我国,文科教育长期承担着文化传承的功能。无论是对古代哲学思想的学习,还是对历史经典的诠释,文科一直是传递文化精髓的载体。但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再只是对古代经典的尊重和阅读,更是要在当代社会对其进行再创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比如,在传统文学的教学中,文科教育不仅要让学生学习《论语》、唐诗宋词等经典文献,更

要引导学生思考这些作品如何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如何从中汲取对社会道德、国家治理和人际关系的启示。AI的引入为此过程提供了新范式。人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 and 语料库工具,使学生更精准地理解经典文献的语言特征和历史背景,探索文本的深层次含义。

文化自信的内涵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还包括对现代文化的创新。当今,AI不仅是工具,更是文化创新的助推器。文科教育应鼓励学生通过AI技术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解读和再创造。例如,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学生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文化遗产、体验历史事件,创新性地重构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让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

其次,全球知识体系的对接是跨文化交流与多元思想的碰撞。全球化为文科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也对传统文科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科不再是单纯的学术知识积累,还承载着跨文化交流与全球合作的使命。在此过程中,如何将中国的文化自信与全球知识体系进行有效对接,成为当前文科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众所周知,全球化使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变得愈加频繁。文科教育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找到自身位置。既要坚持文化自信,又要与其他文化进行深度对话与交流。例如,在英语文学教学中,我们应引导学生在关注西方文学经典的同时,通过对比分析,理解其他文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非西方文化中的文学创作。这种跨文化对比和学习能让学生更全面地认识世界,拓宽全球视野,提升跨文化理解能力。

全球化背景下,文科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思想的碰撞和融合。现代文科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鼓励他们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AI时代,跨学科的融合更为重要,文科教育应注重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尤其是与科技类学科的融合。

比如,历史学的研究不再只依赖文献阅读和考古分析,AI技术使研究者能通过大数据寻找历史事件间的关系,解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互动。文学批评也不再只是静态的文本分析,AI能从语义、结构、情感等多维度对文本进行深入挖掘。这种跨学科的合作和多元思维的

培养,使学生在面对全球化、数字化和多元文化时更具适应力和创新能力。

## AI时代文科的创新使命:知识的全球共享与中国智慧的输出

新一轮学科调整中,文科不仅是学术和知识的传承,更应在以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文科教育的目标不仅是传承历史与文化,还要在新的科技背景下,反思人类与技术的关系,特别是在AI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保持人类的独立性、创造力和社会责任感。文科不应只依赖传统的教育方法,而应与技术结合,培养能跨越学科壁垒、理解并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人才。

其次,未来的学科设置应更注重跨学科的融合。在对传统文学、历史或哲学进行单纯研究之外,文科更应与理工科和社会科学结合,帮助学生从多角度、多学科的视野理解世界。AI时代,学科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文科的“跨界”能力将成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最后,在全球化进程中,文科的作用尤为关键。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不仅能帮助学生了解自身文化根基,还能培养其跨文化的理解和交流能力。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今天,如何通过文科教育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智慧,是未来文科教育不可回避的课题。

然而,在AI时代,文科教育不仅要找到新定位与发展路径,更要承担知识输出和文化传播的使命。这项使命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走向全球共享的知识创新。AI为文科教育提供了全球知识共享的新机遇。通过数字化平台、在线教育和开放式课程,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能更方便地共享知识、进行跨文化学习。例如,学者可以通过国际合作研究平台,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与解读,从而提升全球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认知与理解。

二是让中国智慧在全球传播。中国的文化思想的全球传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崛起,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度日益增加。在此过程中,文科教育应帮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并将其与现代社会的需求相结合,创新性地传播中国思想和价值观。AI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历史、哲学思想和社会价值传递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独特智慧和社会经验。

无可否认,AI时代给文科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文科教育需要在保持其传统文化价值的同时,在新时代背景下重塑其核心价值目标。通过人文精神与科技创新的双重驱动,文科教育将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培养出具有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全球责任感的未来公民。在未来的文科教育中,科技不仅是工具,更是教育创新的动力源泉,我们需要找到技术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平衡点,在AI时代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学习体验,帮助他们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 “双非”院校学硕调剂遇冷,未来怎么办

■刘爱生

每年四月,许多考研一志愿落败的考生都会踏上茫茫的调剂之路。许多“双非”院校(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非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此时也忙乱起来,因为多年招生经验表明,学校大部分学术型硕士招不满人,其中不乏一志愿零上线的尴尬现象。许多“双非”院校也乐见学生调剂,因为调剂的“池子”够大,更有可能挑到好苗子。

按照惯例,当某个专业出现空额时,往往不缺调剂生源。然而据笔者了解,今年不少“双非”院校出现调剂缺额的情况,个别专业甚至出现“零调剂”现象。按此趋势,“双非”院校以后可能面临学术型硕士招不到或招不满的情况。

## 形势变化导致调剂遇冷

为何今年“双非”院校学术型硕士调剂市场会遇冷?一个直观原因是考研报名人数大幅减少。据统计,2025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为388万,较2024年减少50万,降幅达11.42%;与2023年的峰值474万相比,两年累计减少86万,创近10年来最大降幅。报名人数的大幅缩水,自然会影响到调剂“池子”的人数。当然,最根本原因恐怕是读研就业前景失去信心。近几年,研究生扩招导致学历“含金量”下降,部分专业毕业生面临“高学历低就业”困境。另外,一些考生会做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认为读研“不划算”。

在此背景下,没有光环加持的“双非”院校的学术型硕士遭遇的挑战则更大。以教育学为例,其分为专硕和学硕,前者以培养高素质中小学教师为目的,后者的培养目标则模糊得多。若干年前,“双非”院校的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已出现了就业难的情况,但总体而言,大部分最终还能顺利就业——为数不多的学生选择深造读博,少数考运儿考取了公务员或企事业单位,大多数学生则靠着教育学硕士学位“擦

边”进入中小学任教。

但近两年,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成为中小学教师变得越来困难。究其原因,一是很多地方教师岗位饱和,二是教育专硕的兴起挤压了学硕就业市场。当前,不少师范大学大幅扩招教育专硕,且由于教育专硕更贴近中小学需求(即所谓专业对口),使得学校在招聘时会优先考虑专硕,而非学硕。

在此背景下,“双非”院校学术型硕士调剂遇冷也就情有可原了——与其花费3年,再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不如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就业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理性回归,而非盲目跟风。

## 逐渐成为鸡肋的学硕

在我国,学术型硕士制度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主要效仿苏联的教育体系,以培养科研和教学人才为目标,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学位教育模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前十年,学术型硕士的培养在短期内改善了高校师资紧张和科研力量不足的窘况。然而,随着我国高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和博士生的扩招,目前高校普遍将教师的入门门槛调整为博士,除少数艺术类专业外,极少有本科高校招聘硕士学历的教师。换言之,学术型硕士早已失去了作为高校师资力量的价值。

在此背景下,2010年,教育部对研究生结构做出改革,减少学术型硕士招生名额,扩大专业型硕士规模。这种改革既顺应了国内高校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趋势,也是与国际研究生培养接轨的体现。欧美高等教育体系通常不明确区分“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例如,美国的硕士学位分为授课型硕士和研究型硕士。前者以课程学习为主,注重实践技能,学制通常1-2年;后者以独立研究和论文为核心,主要为攻

读博士或从事科研做准备,更接近中国的学术型硕士。当然,更常见的情况是学生本科毕业后,直接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即所谓“硕博连读”),如果学生没有在第二年或第三年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将会获得一个安慰性质的硕士学位。

但问题在于,我国目前仍将学术型硕士定位为一种具有独立就业导向的学位,而非博士预备阶段。以2023年为例,我国共招收博士生约13.5万人。其中,硕博连读占比约35%(部分“双一流”高校可达50%),年招生量约4.7万人;本科直博占比约12.5%,年招生量约为1.7万人;普通招考(硕士毕业后考博)占比约52.5%,年招生量约为7万人。同时,当年学硕招生数量约为27.4万人。可见,硕博连读和本科直博已成为重要路径,尤其头部高校更倾向于贯通式培养。未来,学硕尤其是“双非”院校的学硕,如果想读博,需更依赖普通招考或跨校申请,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剧。

在深造渺茫、就业困难的双重夹击下,学术型硕士作为一个专门层次的学历,其处境日益尴尬,越来越成为人们口中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一点在“双非”院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双非”院校学硕的发展之路

在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下,一些老牌“双非”院校每年还是招为数不少的学术型硕士。近两年,一些新获得专业硕士招生资格的本科院校,仍有发展学术型硕士项目的计划。但今年许多“双非”院校出现考研调剂遇冷的情况,足以给我们敲响警钟。那么,学术型硕士,尤其是“双非”院校的学术型硕士未来该如何发展?首先,在新形势下,政府应在政策层面重构学术型硕士的定位,明确将学硕定位为“博士教育的过渡阶段”,而非具有独立就业导向的学位。在此定位下,学术型硕士可理解为“试

错阶段”,为学生提供3年时间探索学术兴趣,避免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盲目性。

其次,一旦将学硕定位为“博士教育的过渡阶段”,有关部门便有必要在学术型硕士与博士招生之间维持某种动态平衡。鉴于目前二者招生数量失衡,政府需要通过招生计划调控,逐渐缩减学术型硕士招生名额,进一步提高专业型硕士占比。对于研究型大学,可保留学术型硕士,并将其作为博士预备阶段;对于“双非”院校,尤其是地方应用型大学或教学型大学,则应大力缩减学术型硕士规模。

再次,建立学术型硕士点退出机制。例如,对于连续两年出现招生不足,或就业率持续低于警戒线的现有学术型硕士点,应实行减招或停招;对于导师数量不达标、生均科研经费低或缺乏科研产出的“双非”院校,则应予以“黄牌警告”(限期整改)或令其“红牌退出”(停止招生)。此举一是防止“双非”院校为追求规模而盲目开设学术型硕士点,二是倒逼院校向应用型培养(如联合企业开设产业硕士)或特色学科(如服务地方经济的相关领域)聚焦。

最后,强化学术型硕士“实践-学术”融合。虽然笔者将学术型硕士定位为“博士教育的过渡阶段”,但并不表示其作为一个独立学位就完全没有存在价值。在我国,部分行业(如高职院校教师、地方科研机构助理研究员、智库分析师)仍以学术型硕士为招聘基础;某些岗位需要理论分析能力,学硕的培养目标与之直接匹配。这就要求高校在学术型硕士的培养过程中,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例如,高校可以推行“学术+职业”双轨培养,在保持学术训练的同时,增设行业实践模块。对于理工科学硕,可鼓励其与企业合作开发“产品原型设计”项目,要求学生完成从理论到应用的转化;对于人文社科学硕,可以适当发展其咨政报告写作能力,提升其政策分析能力。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教授)



李锋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在文中探讨了人工智能深度介入高校教师应主导师生关系。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如潮水般侵入高校的各个角落,深刻改变了教学与科研的生态图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从课堂上的互动答疑,到学术研究中的资料整理与创意激发,各种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逐渐成为高校师生学习与工作的“必需品”,甚至重塑全球高等教育的版图。这必将对传统的高校师生关系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在课程教学中,师生间的互动关系将发生范式的转移。根据高等教育管理数据与咨询机构麦可思对3000多名高校师生的问卷调查结果,近六成高校师生每天或每周多次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综合多项调研可以发现,无论哪个学科的学生都更愿应用人工智能可以提高自身学习效率。而当学生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轻松完成大部分课程作业时,教师在知识传授环节的中心地位将大幅度削弱,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师生互动也必须从传统的“单向教授”向“双向协同”模式演化。

鉴于此,教师需要而且必须从单纯的知识输送者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帮助学生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通过设计有挑战的学习场景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教师需要从单向的评判者转变为共同的探索者,帮助学生建立批判性思维,引导学生辨别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提供答案的准确性,和学生一起探索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在科学研究中,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关系将向合作关系进行偏移。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但能提高导师的科研效率,也可以提高学生的科研效率。以往,导师可以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娴熟的研究方法以及丰富的研究经验,为学生提供研究方向的指引、研究方法的培训,以及论文写作的全过程、全方位指导。然而,如今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已经能协助学生进行文献综述、数据分析、创意凝练、论文润色等工作。这使得学生在遇到学术研究的困难时,会更多寻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帮助,进而大幅度降低对导师指导的依赖程度。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导师与学生间的传统学术等级关系。

因此,导师应该对学生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并以更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生,成为学生名副其实的“良师益友”,并且思考如何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优势与自身的专业指导相结合,以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

年轻人往往更容易接受与拥抱新技术,也更容易成为新技术的熟练使用者,在高校师生关系发生重构的情况下,教师反而可能成为“弱势群体”。因此,需要尽快行动以迎接重构带来的各种挑战。

首先,在这场教育史上的智能革命中,教师不能是被动技术适应者,而应成为积极的范式革新者。教师需要积极学习和掌握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方法,了解其优势和局限性,并将其合理地融入教学和科研中。当教师以开放姿态拥抱技术变革,以教育智慧驾驭智能工具,就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开辟更具生命力的育人新境界。

当教师具备了数字化素养,成为“数字导师”,便可以在师生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老师可能不再是学术知识的传授者,但依然可以为学生搭建认知“脚手架”,帮助学生在学上完成知识整合、在科研上实现协同创新。

其次,除了传授知识与科学研究外,高校教师更重要的职责是立德树人,这不会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而发生本质变化。因此,教师不能因为传授知识和指导科研的职责减轻而放弃立德树人的职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通过言传身教,向学生传递严谨的学术态度、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学术研究中,导师能凭借自身的经验和智慧,帮助学生克服困难,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在上述过程中,教师在学生遇到困难时给予的鼓励,在学生取得进步时给予的肯定,都是学生前进的动力源泉。因此,在智能时代,教师依然应该成为学生学习与学术的引路人、职业发展的规划者和人生道路上的导师。

与此同时,高校也应该为智能时代师生关系的重构进行制度创新与文化重塑,帮助教师提升数字教育能力,建立新的教育教学评估体系,比如设立“具有学术想象力”“重视学术伦理教育”等新型评价指标。这样,不管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高等教育图景必将是人类教育智慧与人工智能技术交相辉映的生态,教师始终是这一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守望者。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化教育背景下的教育质量评价研究”(22JJD880002)阶段性成果)

人工智能深度介入,高校教师应主导师生关系